

# 中古梵僧入唐与复数标记“们”的产生\*

陈永霖 叶晓锋\*\*

**[摘要]** 现代汉语复数标记“们”的起源一直没有定论。本文发现印度的梵文、印度一雅利安语言以及达罗毗荼语言有 -me、-mi、-mu、-wu、-min 等复数标记，这些形式和中国中古时期以来突然出现的“弭”“伟”“每”“𢵃”“们”完全对应。结合唐代印度梵僧大量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本文认为汉语 m- (> w-) 声母系列复数标记应该是来自印度的语言。

**[关键词]** 复数标记 “们” 佛教传播 丝绸之路 语言接触

## 一 引 论

现代汉语中，表示复数意义的语法标记是“们”。汉语史和方言中，与之相关的有一系列复数标记。吕叔湘（2002）、江蓝生（1995, 2018）、祖生利（2005）等学者指出：最早在唐代出现了“弭”、“弥”和“伟”等复数标记，随后在宋代出现了“𢵃”“瞒”“门”“们”等鼻音韵尾复数标记，元代则基本采用“每”作为复数标记，明代重新使用“们”作为复数标记，一直延续到现在<sup>①</sup>。这些复数标记中，“们”“弭”“弥”的声母都是 /m/，而“伟”的声母是 /w/。从发音看，/m/ 和/w/ 都是唇音；语音演变中两者关系密切，/m/ 经常会变成/w/<sup>②</sup>。鉴于此，把“们”和“弭”、“弥”、“伟”等声母同为唇音的这些复数标记放在一起讨论是有道理的。

关于“们”等唇音声母复数标记的起源，学界多有讨论。

第一种观点，复数标记“们”来自于“辈”。吕叔湘（1985:61）把“们”和上古汉语的“辈”关联起来，从句法功能角度看，这两者存在重合，不过吕先生比较慎重，表示并不能肯定说“们”是“辈”的化身。其后冯春田（2000）、朱庆之（2014）都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语音上得不到解释。“辈”和“们”的声母确实都是双唇音，但前者为塞音、后者为鼻音，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而在语音的演变中，鼻音变为塞音很常见，而塞音演变为鼻音则很罕见。比如在唐五代西北方言中，m > b 很常见，明母字经常读塞音，如“味” byi、“问” bun、“物” bur（罗常培 2012:17）。但是反向的演变就非常罕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沿线语言比较视野中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17BYY138）”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马贝加、杨永龙、方一新、王云路、王小盾、金理新、王丁、胡鸿雁、金文兵、张文冠、王诚、孟奕辰、胡平、祁刚诸位老师和学友的指导和帮助；承蒙方一新老师美意，初稿曾在“浙江大学汉语史研读会”（杭州 2019.1.8）上宣读，得到许多师友的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 通讯作者，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42461539@qq.com。

① 对于这种交替，付新军（2018）提出了相关解释。

② 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就包括 m > w（详见杨剑桥 2012:133-147）。

第二种观点，复数标记“们”来自于“物”。江蓝生（1995, 2018）认为“们”在语源上和“物”可能相关，因为古汉语中“物”可以表示类别，类别词进而转化为复数标记。但是这一观点也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李艳惠、石毓智（2000）已经指出：“们”基本上用来表示“人”的复数，而“物”主要是非“人”范畴的复数标记。袁宾等（2001:310-311）则指出这一假说主要是缺乏文献上的证据，文献中并没有“我物”“你物”之类的证据。

第三种观点，复数标记“们”来自于“门”。俞敏（1989）、太田辰夫（2003:316）认为古汉语中“门”可以表示“同一族的人”，进而演化为复数标记。不过正如江蓝生（2018）所指出的，这个说法没法解释和复数“弭”之间的音变关系。同时也没法解释“族”同样可以表示“家族”且更为常见，然而并没有演变为复数标记。

对于“们”的来源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以上三类，总体上缺乏坚实的证据链，因此复数标记“们”以及相关复数标记的来历仍未解决。

本文主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讨论“们”的起源。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汉语方言和文献中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

## 二 汉语的唇音声母系列复数标记

### （一）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唇音声母系列复数标记

在官话方言中，唇音声母系列复数标记主要有四类语音形式<sup>①</sup>：

1. MVN。这类复数标记主要包含三种形式（陈章太、李行健 1996:4347）：第一类为 mən，如“我们”，北京 uo<sup>3</sup> mən、武汉 uo<sup>3</sup> mən、成都 ɿo<sup>3</sup> mən；第二类为 məŋ，如“我们”，平山 və<sup>3</sup> məŋ、忻州 ɿɛ<sup>3</sup> məŋ；第三类为 mə，如“我们”，兰州 vɿ<sup>3</sup> mə、青岛 uə<sup>3</sup> mə。

2. MV。这类复数标记在官话方言中主要形式有：mu、me、mɛ、mə 以及 mi。如敦煌方言 ɿə<sup>42</sup> mu<sup>2</sup> “我们”、ɿi<sup>42</sup> mu<sup>2</sup> “你们”（刘伶 1988:190）；临河方言 vɿ<sup>3</sup> me “我们”；大理方言 ɿo<sup>3</sup> me<sup>2</sup> “我们”；集宁方言 vɛ<sup>3</sup> mə “我们”（陈章太、李行健 1996:4347）。又如临县、方山方言 ɿɔ<sup>31</sup> mi<sup>55</sup> “我们”（侯精一、温端政 1993:117）。总的来看，这些方言中复数标记的语音形式都是鼻音 m- 和一个元音相结合，极个别方言点的元音带喉塞尾。

3. M。这类复数标记主要表现形式为自成音节鼻音 m̩。如银川方言 və<sup>53</sup> m̩ “我们”、ni<sup>53</sup> m̩ “你们”（高葆泰、林涛 1993:136）；山西祁县方言 ɿa<sup>213-33</sup> m̩<sup>33-55</sup> “我们”、m̩<sup>213-33</sup> m̩<sup>33-55</sup> “你们”（侯精一、温端政 1993:117）。

4. U (WU)。这一类复数标记形式比较特殊，一般为零声母，韵母一般都含有 u 元音，而 u 天然具有唇音特征。在西北方言中例子比较多，一般见于第二人称复数“你们”，如中卫方言（黄河以南）niəu<sup>13</sup>、朔州方言 niu<sup>213</sup>、山阴方言 niəu<sup>52</sup>、偏关方言 niou<sup>35</sup>（林涛等 1995:153；侯精一、温端政 1993:118）。可以看出，这些第二人称复数特殊形式如果剔除第二人称代词 ni/ni，那么第二人称复数标记其实是 -u、-əu、-ou，这些复数标记都跟 -u 有关；有可能 -u (或 wu) 是第二人称复数较早的形式。复数标记 -u 可能来自于声母 /m-/ 零声母化或者 mu。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四类唇音声母复数标记中，自成音节鼻音 m̩ (M) 与 mən (MVN)

<sup>①</sup> 为方便称说，官话唇音声母系列复数标记的语音形式类型用大写字母来表示：M 表示 /m/，V(vowel) 表示元音，N (nasal) 表示鼻音，U 表示 /u/，W 表示 /w/。后文表 7 中复数标记的语音形式标示同此。

两者之间经常自由变读。比如，北京话口语的  $uom^3$  lia<sup>3</sup> “我们俩”、 $nim^3$  lia<sup>3</sup> “你们俩”，可以看到 [mən] 变成了 [m]（袁家骅 1960:48）；在四川方言中，“我们”在听觉上可以变为  $\etao^3 m$  或  $\etaom^3$ ，甚至是  $\etao^3 mən^1$ （张一舟等 2001:216-217）。另外，mu 也经常会演变成自成音节鼻音  $m̩$ （Shen 2006；叶晓锋 2008:37）。由此可见， $m̩$  和  $mən$  以及 mu 之间语音上非常密切。

## （二）中古至近代文献中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

根据出现时间的先后，中古至近代文献中唇音声母复数标记<sup>①</sup>主要分为三类。

### 1. “伟”

“伟”是较早出现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唐代《嘉话录》<sup>②</sup>：“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  
懿邓邓把将他官职去。”吕叔湘（1985:55）指出，“措大伟”也就是“措大们”，“伟” vei 原来的读音也可能是 mei。江蓝生（2018）也补充方言的证据，证明“伟”和后来的“每”相关。从《广韵》系统看，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根据敦煌吐蕃汉藏对音材料，敦煌文献中的复数标记“伟”读音也可能是 u。在敦煌吐蕃汉藏对音中，影云以三母的止摄合口字经常直接对应  $\emptyset$ <sup>③</sup>，如果按照 Jäschke (1881:498) 的转写，就是 u。敦煌吐蕃的汉藏对音材料中，云母止摄合口字基本上都是对应 u 或 wu<sup>④</sup>，如“围” u、“违” u 或 wu、“纬” u、“为” u、“谓” u（周季文、谢后芳 2006:58-59）。因此敦煌文献中的复数标记“伟”的语音形式也有可能就是 /wu/ 或 /u/，这样就和现在西北官话方言中第二人称复数标记 -u 是一样的<sup>⑤</sup>。两者可能存在关联。

### 2. “弭”、“弥”和“每”

“弭”（或“弥”）作为复数标记，最早见于赵璘《因话录》：“卢尚书……低头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我弭”又作“我弥”，“我弭”（或“我弥”）就是“我们”（吕叔湘 1985:54-55；周勋初 1987:607-608）。元明时期又出现了“每”，如“官员每”、“军人每”。江蓝生（2018）指出，“官员每”、“军人每”就是指“官员们”、“军人们”，与“弭”是同一个系列的。这一类复数标记基本上和方言中声母为 m- 而无鼻音韵尾的复数标记对应。

### 3. “憇”、“满”、“门”和“们”

“憇”“满”“门”作为复数标记，最早见于宋代，“憇，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其他如“孩儿憇切记之”、“相公憇悉起”、“失笑他满任撩乱”、“本朝大人门煞怒”、“你门只

<sup>①</sup> 关于中古至近代文献中唇音声母复数标记的研究，吕叔湘（2002）、太田辰夫（2003:108）、吕叔湘（1985:55）、王力（2004:271）、江蓝生（2018）等学者贡献巨大，本文中古至近代复数标记的语料基本是采用这些前辈学者文章中所使用的，下文如《嘉话录》《唐语林》《攻媿集》《默记》《因话录》以及其他宋代汉语复数标记相关的语料都是直接引自吕叔湘先生的论著。

<sup>②</sup> 中华书局点校本《太平广记》（卷 260）（李昉 1961:2032）作：“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懿邓。  
邓把将他官职去。”吕叔湘（1985:55）此处引文作：“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懿邓邓把将作官职去。”江蓝生（2018）则作：“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懿邓邓把将官职去。”三处引文略有不同，中华书局点校本“把  
将他官职去”，从语义来看更为通畅，但是前面文句的点校显然是吕叔湘（1985:55）和江蓝生（2018）更佳，  
因此我们综合各家、各版本优点对这句话重新加以点校。

<sup>③</sup> 藏文  $\alpha$ ，周季文、谢后芳（2006:58-59）用  $\emptyset$  来转写，但是 Jäschke (1881:498) 指出， $\alpha$  其实就是表示元音的记号，表示没有任何辅音的色彩，相当于零声母，从语音描写角度看可以不用转写。这样， $\emptyset$  可以直接转写为 u 或者 wu。

<sup>④</sup> 带有 -i 痕迹的只有一个例子，“韦” wui（周季文、谢后芳 2006:58）。

<sup>⑤</sup> 当然，正如吕叔湘、江蓝生等先生所说， $m̩ > v/u$  或  $mu > wu$  都是很常见的音变，因此理论上“伟” \*u 或 \*wu 的早期形式也有可能是 \*m̩ 或 \*mu。

有一个日头活哩”、“虽然微禄不比他们丰厚”，这里的“懑”、“满”、“门”和“们”与现代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是一样的（详见吕叔湘 1985:54-55）。

可以看出，中古至近代文献中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基本可以和汉语官话方言中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对应，自成音节鼻音复数标记 -m 在文献中找不到直接的对应字词，不过从中古新出现的“俺”（我们）\*am、“您、恁”（你们）\*nim 都是收 -m 韵尾（吕叔湘 2002），这些可以看出自成音节鼻音复数标记 -m 附着在人称代词上了。

### 三 达罗毗荼语言和梵文的复数标记

#### （一）达罗毗荼语的复数标记

印度境内的语言基本有四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印欧语系（如印度—雅利安语）、南亚语系（如蒙达语）、汉藏语系。在印度—雅利安人进入之前，说达罗毗荼语和蒙达语的人群就已经在印度次大陆生息了，并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扩散到印度各地。达罗毗荼语历史非常悠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典泰米尔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5—6 世纪（Krishnamurti 2003:5-6；Rajam 1992:1）。

值得注意的是，就复数标记而言，达罗毗荼语与汉语非常相似，其语音形式表现为 /m/、/mu/、/wu/、/mar/ 等。

早在古典泰米尔语中，-m、-mār 就可以充当复数标记，一般都用于人称代词和有生名词。-m 用于人称代词，如：nām “我们”(<nāŋ “我”)、tām “他们”(<tāŋ “他”)，-m 为复数标记；-mār 是用于有生名词的复数标记，如 tōlimār “女同伴们” < tōli “女同伴” + mār “们”（Rajam 1992:271、274、281）。

再看现代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复数形式和复数标记。如表 1 所示：

表 1 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sup>①</sup>

语言	我	我们	你	你们
泰米尔语	yāŋ	yām (排除式), nām (包括式)	nī	nīm
Malayalam 语	nān	nām、namma	nī	nīm
Kannada 语	ān	ām、nam、nawu	nīn	nīm
Kui 语	anu	amu	inu	nīm

从表 1 可以看到，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复数标记除了-m、和 -mar/mār 外，还有 -ma、-me、-mbe、(-mu>)-wu。-wu 和上文提到的唐代西北方言中的“伟”读音一样，很值得注意。

需要注意的是，除上述复数标记形式以外，与古典泰米尔语一样，泰米尔语、Malayalam 语还有一个词缀 -mār 表示复数，主要用于与“人”相关的有生名词。如泰米尔语中，tembi mār “弟弟们” < tembi “弟弟” + mār “们”；Malayalam 语 tambimār “弟弟们” < tembi “弟弟” + mār “们”（Andronov 2003:109）。Andronov (2003:109) 认为 -mār 是两个复数的叠加形式，

<sup>①</sup> 表 1 材料来自 Andronov (2003:156-160)。达罗毗荼语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比较复杂，第一、第二人称复数标记基本上都和 -m 有关，第三人称复数一般都是加流音韵尾，如古典泰米尔语的 ivan “他”、ivar “他们” (Andronov 2003:156)。

即 -mā 和 -r 叠加，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中 -r 也可以表示复数。

## (二) 借入到印度—雅利安语中的双唇鼻音复数标记

梵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是印度—雅利安语言中具有极为悠久历史的书面语的一种语言。一般认为，梵文的复数标记有-as、-ayas、-yas、-āni 等，其中以-as 最为常见，这也与原始印欧语的复数标记 \*-es 对应 (Masica 1991:230; Burrow 2001:236)，即原始印欧语的复数标记 \*-es 对应于梵文的复数标记 -as/-s<sup>①</sup> (Burrow 2001:235-236)。

雅利安人后来征服了印度许多土著民族，其中包括部分使用达罗毗荼语言的民族。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印度—雅利安语言和文化也受到了达罗毗荼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从印度—雅利安古老的书面语梵文来看，也吸收了许多达罗毗荼语的成分，比如梵文 mayura- 借自原始达罗毗荼语 \*may-Vr“孔雀”、bála“力量”借自原始达罗毗荼语 \*wal (Krishnamurti 2003:37)。

在部分印度—雅利安语的复数形式中，除了与原始印欧语的复数标记 \*-es 对应的形式外，-m、-me、-mē、-bi、-mōn、-man 等也可以作为复数标记，而且经常用于有生名词。基于印度—雅利安语言和达罗毗荼语言的语言接触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此类双唇音起首复数标记也是从达罗毗荼语言借入到包括梵文在内的印度—雅利安语言的。见表 2：

表 2 一些印度—雅利安语的第一第二人称单复数形式<sup>②</sup>

语言	我	我们	你	你们
Bhatri 语	—	—	tui	tomi, tomimōn
Bhojpuri 语	ham	hamman	—	—
Gujuri 语	hū	ham	—	—
Desia 语	—	—	tu	tummōne
Baghati	aū	hamē	tū	tumē
Baghi 语	ā	āmmē	tu	ture
Suketi 语（东部）	hā	hāmmē	tū	tūmmē

从表 2 可以看到，Bhatri 语、Gujuri 语的一部分代词的形式可以直接加 -m 作复数标记。Bhatri 语中甚至还出现了复数标记叠用现象。本来 tom-i “你们”是 tu-i “你”的复数形式，

<sup>①</sup> Burrow 比较谨慎地指出，梵文复数形式中经常出现的 -s 可能是复数标记，如工具格复数 -bhīs、与格复数 -bhās、处所格复数 -su。

<sup>②</sup> 表 2 材料来自 Bailey (1908, 1920)、Pattanaik (2002)。在印度—雅利安语中，复数标记经常随着格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主要选取人称代词主格的复数，因为相对而言，主格是无标记的。由于部分语言中，代词比较复杂，有多个系统和不同的复数后缀，为了方便比较，我们仅选取跟达罗毗荼语 -m 或 -me 等复数标记直接相关的语料。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印度—雅利安语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都是 (M) V 结构，如“我”，Shina 语 ma、Romany 语 me，旁遮普语 mai、印地语 mai、Sindhi 语 ma、au (Masica 1993:252)；但其对应的复数形式“我们”则分别是，Shina 语 be、Romany 语 asi、旁遮普语 asi、印地语 ham、Sindhi 语 asi。显然，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有两个不同的词根，因为看不出它们形态上的直接对应关系。这一点从 Sindhi 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Sindhi 语同时有两个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ma、au，这给我们很大启发，即分析印度—雅利安语复数时，要注意人称代词可能具有多套不同来源的词根。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选取表 2 中的印度—雅利安语的标准是，第一人称词根为 a 或 ha，第二人称词根为 tu，复数标记为 -m、-me 等形式。印度—雅利安语的第一人称词根 a，可能和达罗毗荼语有关。

但是第二人称复数还有另外一个形式 *təm-i-mən*, 是在第二人称复数 *təm-i* 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个复数标记 *-mən*。Desia 语里的“你们”也是在 *tu* “你”后面添加 *-m* 后缀, 之后又增加一个复数后缀<sup>①</sup>, 构成了两个复数后缀叠加。Suketi 语(东部)的 *hām* 本来是 *hā* “我”的复数形式, 可是后面又叠加了一个复数标记 *-mě*,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复数标记叠用, 这在印度语言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吕叔湘(1985:72)曾指出语言中复数用作单数的现象, 表达一种谦卑的口吻。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即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用来表示单数, 在原来的复数形式基础上再叠加复数标记构成新的复数形式。比如 Oriya 语, *mū* “我”、*ame* “我们”, *tu*、*tume*(礼貌形式)“你”、*tumemane*“你们”(既可以是随便形式也可以作礼貌形式)(Pattanaik 2002:39)。

值得一提的是, 梵文中的 *aham* “我”和佛教混合梵文的 *ham* “我”语源一直不明,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找到答案。在表 2 中, Gujurī 语的 *ham* 表示“我们”, 其中 *-m* 为复数后缀; 而 Bhojpuri 语的 *ham* 则表示“我”, 其实是复数用作单数。梵文 *aham* 和佛教混合梵文 *ham* 与 Bhojpuri 语 *ham* “我”非常相似, 应该是和达罗毗荼语有关。

### (三) 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的特殊复数标记

首先来看梵文以外的一些印度—雅利安语言人称代词的情况。见表 3:

表 3 一些印度—雅利安语言的人称代词形式<sup>②</sup>

语言	我	我们	你	你们
Baghi 语	ā	—	—	—
Cameali 语	—	asī	tū	tusī
Siraji 语	—	assē	tū	tussē
Mandeali 语	—	asse	tū	tussē
Bilaspuri 语	—	asi	tu	tusi

对表 3 材料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许多印度—雅利安语第一人称单数形式为 *a*, 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为 *tu*, 复数标记则是 *-s/as/-s(-)*<sup>③</sup>。这可为分析梵文人称代词系统提供直观的证据。

梵文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比较复杂。仅从第一人称的材料就可窥一斑, 如第一人称单数主格 *ahám*、致使格 *mā* 和 *mám*、工具格 *māyá*、与格 *māt*, 而第一人称复数主格 *vayám*、致使格 *asmán*、工具格 *asmábhís*、与格 *asmát*。我们将 Burrow (2001:263-266) 的材料直接整理成表格形式。如表 4:

<sup>①</sup> 与 *mōne* 语音形式相似的复数标记还有 *-mane* 和 *-mene*。印度 Orisa 地区普遍使用印度—雅利安语言。Orisa 地区的 Sambalpuri 语一般有生名词复数用 *-mane* 来表示, 无生名词复数使用 *-gura* 来表示, 比如 *lok* “人”的复数形式为 *lokmane* “人们”、*chua* “孩子, 儿子”的复数形式为 *chuamane* “孩子们, 儿子们”。Kela 语的 *-menē* 表示与“人”有关的名词的复数, 如 *po* “儿子”的复数形式为 *pomenē* “儿子们”、*cha* “孩子”的复数形式为 *chamenē* “孩子们”、*lok* “人”的复数形式为 *lokmenē* “人们”; 但是人称代词的复数标记是 *-ru*, 如 *o* “他”、*oru* “他们”。以上语料来自 Pattanaik (2002:143、159、174、177)。

<sup>②</sup> 表 3 材料来自 Bailey (1908, 1920)、Masica (1991:252)、Rensch et al. (1992:176)。为了便于比较, 材料选取的标准是: 第一人称代词词根为 *a*, 第二人称代词词根为 *tu*, 复数标记形式为 *-s*、*-si*、*-se* 等。Cameali 语 *hau*、Siraji 语 *hau*、Mandeali 语 *hau*、Bilaspuri 语 *mai*、*hau* 等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 以及 Baghi 语的“我们”*amme*、“你”*tu*、“你们”*tumme* 等形式, 因与下文分析几无关系, 未列入表 3。

<sup>③</sup> 为了讨论方便, 只选用主格的复数形式。

表4 梵文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形式<sup>①</sup>

人称/数	主格	致使格	工具格	与格
第一人称单数	ahám	mā、mám	māyá	māt
第一人称复数	vayám	asmán	asmábhis	asmát
第二人称单数	tvám	tvám、tvá	tváyā	tváyt
第二人称复数	yūyám	yusmán、vas	yusmábhis	yusmát

从表4可以看出梵文的人称代词比较繁杂。第一人称的单数主格为 ahám、致使格为 mā，第一人称复数主格为 vayám、致使格为 asmán，几乎看不出第一人称本身的词根。但是这种复杂性恰恰反映了印度其他土著语言在早期对梵文的渗透和影响，也就是说梵文中的代词其实存在多个来源。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根据人称代词的词根区别，梵文的人称代词也分为多个不同的系统。第一人称复数的致使格 asmán、工具格 asmábhis、与格 asmát，与第二人称复数的致使格 yusmán、工具格 yusmábhis、与格 yusmát 是平行的，可以看出第一人称复数词根是 asmá-，第二人称复数词根是 yusmá-。

上文已经指出，在部分印度—雅利安语中，a 是第一人称代词词根，-as 是第一人称复数标记。达罗毗荼语的复数标记 -ma，经常借入到印度—雅利安语。

有鉴于此，梵文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asmá、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yusmá，应该切分为：a-s-má、yu-s-má。其中，a- 是第一人称代词词根，yu- 是第二人称代词词根，-s 是复数标记，-má 也是复数标记，后者来自达罗毗荼语的复数标记 -ma。可以看出，asmá 和 yusmá 这两个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也存在上文所讨论的复数标记叠用现象。再看表5：

表5 佛教混合梵文的第一第二人称代词<sup>②</sup>

语言	第一人称单数	第一人称复数	第二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复数
佛教 混合 梵文	ham、aha、ha、hu、 ma	vaya、 asme、asco、asmi、asmin no、mo、me	tva、 tuva(m)、tuma(m)、 tuham、tvuyi	yūya、 yusme、yusmi、yusma

佛教混合梵文的代词主格形式，看起来也非常复杂。上文我们已经指出，梵文中的代词其实存在多个来源。但是参照上文对梵文的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佛教混合梵文的 asme、asco、yusme、yusmi、yusma 这些人称代词复数形式中，a- 是第一人称代词词根，yu- 是第二人称代词词根，-s 是复数标记，-me、-mi 和 -ma 也是复数标记。

为更方便地说明梵文、佛教混合梵文复数标记的情况，我们将其与其他一些印度—雅利安语言简化后的人称代词单复数形式进行比较。见表6：

<sup>①</sup> 梵文的人称代词是有双数形式的，不过与本文讨论内容基本没有关联，因此没有放进来一起讨论。

<sup>②</sup> Edgerton (1985:111) 指出，佛教混合梵文中 asmi 和 asmo 都只出现一次，并不是非常确定。但是从梵文第一人称复数 asmá 以及佛教混合梵文第二人称复数 yusmei、yusmi 可以看出，佛教混合梵文中的 asmi 表示第一人称复数是可以确定的。

表 6 梵文、佛教混合梵文与其他部分印度—雅利安语言的人称代词单复数形式<sup>①</sup>

语言	第一人称单数	第一人称复数	第二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复数
Baghati 语	—	āmme	tu	tume
Baghi 语	ă	āmmē	tu	tume
Bahramgala 语	—	ăs	tu	tus
梵文	—	asmán、asmá	—	yusmán、yusmá
佛教混合梵文	—	asme、asco、asmī、asmin	—	yusme、yusmi、yusma

对表 6 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一定的线索和规律。上文已经谈到佛教混合梵文有两类复数标记，一类是 -s，另一类是 -me、-mi 和 -ma。也就是说，和梵文一样，佛教混合梵文也存在复数标记叠用现象，只不过所叠加的复数标记中，-s 是印度—雅利安语言固有的复数标记，而 -me/-mi/-ma 等则是借自达罗毗荼语言。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部分印度—雅利安语存在具有能产性的复数标记叠加现象，所叠加的两个复数标记都借自达罗毗荼语，而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等印度—雅利安语言中，所叠加的两个复数标记则分别是继承的和借用的，某种意义上，属于模式借用的一种。

至此，我们在第三部分已经明确了四点：(1) 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人称代词系统中，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有一个形式是 a，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是 tu、yu。(2) 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等印度—雅利安语言固有复数标记是 -s/-as。(3) 印度—雅利安语言从达罗毗荼语中借入了一套双唇鼻音系列复数标记，如 -me、-mi、-ma、-man、-mene。(4) 印度—雅利安语言存在复数标记叠加现象。复数标记叠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自达罗毗荼语的两个复数标记叠加使用，如 tume-mane < tume(你们)+ mane(复数标记)“你们”；另一类是固有复数标记 -s/-as 和借自达罗毗荼语的复数标记叠加使用，如 asmán < a(我) + -s(固有复数标记) + mán(借用复数标记)。这种现象产生的语用动因可能是人称代词复数用作单数(谦卑或礼貌形式等)，而原来的人称代词复数转作他用后留下的空位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复数形式来填补。

#### 四 梵僧入唐与汉语“弭”“伟”“们”等复数标记的产生

通过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确定梵文 -sma/smá- 和佛教混合梵文中的 -sme、-smi、-sme、-smin 等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形式是两个复数标记的叠加形式，是由 -s 和 -me、-mi、-me、-ma、-min 两个复数标记叠加而成。梵文的复数标记 -me、-mi、-me、-ma、-min，以及前文提到的印度—雅利安语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 -m、-me、-mē、-mōn、-man 和达罗毗荼语中复数标记 -m、-ma、-me、-mbe、wu，与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汉语历史上的“伟”“弭”“们”等在语音、语义上是平行的。我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相似。见表 7：

<sup>①</sup> 表 6 材料来自 Bailey (1908, 1920)、Edgerton (1985:111、113)。梵文和印度—雅利安语言的代词系统非常复杂，为了方便比较，这里仅仅罗列第一人称代词词根为 a-、第二人称代词词根为 tu-、yu- 的人称代词材料，这样即使有些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有空缺，我们也可以通过表格中的亲属语言的单复数形式，合理推断出其复数形式相对应的单数形式的词根。如 Bahramgala 语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是 mai，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是 ăs，mai 和 ăs 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在表格里 Bahramgala 语第一人称单数空缺。但通过与 Baghi 语的横向比较，可以推断第一人称复数 ăs 的结构是 ă-s，以及其相对应的第一人称单数的词根是 ă-。

表7 中古以来汉语与达罗毗荼语、梵文、佛教混合梵文唇音首复数标记比较

标记	汉语	梵文	佛教混合梵文	印度—雅利安语	达罗毗荼语
M	俺、恁 <sup>①</sup>	—	—	-m、 -m	-m、 -m
MV	弭、每、母	-(s-)má	-me、 -mo、 -mi、 -ma	-me	-mi、 -me、 -mu
MVN	憲、满、们	-(s-)mán <sup>②</sup>	-min	-mən、 -mane、 -m̥	-mar
W	伟	—	—	—	-wu

我们认为，汉语中的唇音声母复数标记出现与唐朝时期印度僧侣沿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有关。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从历史大背景看，梵僧入唐的地点和“弭”“伟”等中古汉语唇音声母复数标记最先出现的地域重合，都是在中国西北地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其后在唐朝永徽到元和年间(650年—806年)达到鼎盛(许理和 2005:30-31; 汤用彤 1982:22-31)。唐代时，敦煌佛教寺院众多，寺院密集的中心尤以长安为最(李映辉 2004:91)。大量胡僧从西北地区进入中国是唐朝佛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最多的是印度僧侣，人数是空前绝后的(介永强 2010)。唐代佛教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北方地区佛教寺院大规模兴办学堂，师资阵容强大、教学水平很高，吸引了大量的世俗弟子，培养了20多名宰相；另外李白、常建、颜真卿等著名文人都与寺院关系密切。可见佛教学堂影响力之大。而官学教育则在唐高宗之后日渐衰微，规模和影响力远远不能和佛教学堂相比<sup>③</sup>(戴军 2003:1；郝春文、陈大伟 2013:14-15)。佛教学堂讲学之前经常要颂梵呗(丁钢 1988:118-120)，大规模佛教寺院学堂的兴办加之大量印度僧侣的进入，使得许多信众有可能接触并学习梵文、佛教混合梵文，甚至达罗毗荼语<sup>④</sup>。因此，复数标记 -mi、 -me、 -mu、 -min 等进入唐代西北地区百姓的日常口语成为可能。“弭”“伟”等复数标记最早产生于唐代西北地区，然后再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至今中国只有东南一带方言尚未被影响和覆盖<sup>⑤</sup>。从历史大背景来看，这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从产生时间看，汉语的唇音声母系列复数标记比佛教混合梵文和达罗毗荼语同类标记出现的时间要晚很多。复数标记“弭”、“弥”及“伟”最早出现于赵璘《因话录》以及敦煌文书中，时间大概在公元800年左右(李一飞 1994)。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等的此类复数标记则分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和公元前2世纪(Burrow 2001:3; Edgerton 1985:5)，比汉语的“弭”、“弥”及“伟”等复数标记要早得多。再结合大量印度僧侣进入唐朝时期的中国以及佛教学堂兴盛这个大背景看，汉语的复数标记“们”最初极有可能是由这些印度僧侣传来的。

第三，从语言的历史比较来看，汉语方言的复数标记“们”有三种语音形式：mən、məŋ

<sup>①</sup> “俺”“您”“恁”都是收 -m 韵尾(吕叔湘 2002)。达罗毗荼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am、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 nim，和汉语的“俺” \*am 与“您” \*nim 是平行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sup>②</sup> 借入汉语的 -(s-)mán 是人称代词与格复数标记(Burrow 2001:263-264)。

<sup>③</sup> 唐代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佛教学馆，但完全是儒学的附庸(丁钢 1988:74)。

<sup>④</sup> 根据介永强(2010)，唐代时有大量中天竺和南天竺的印度僧侣进入中国，而达罗毗荼人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印度中部和南部(季羨林 1998:517)。因此唐代进入中国的印度僧侣中有达罗毗荼人是非常可能的，他们随之带来达罗毗荼语言也就成为了可能。

<sup>⑤</sup> 东南地区佛教寺院几乎没有兴办学堂。

和  $mə̃$ , 所以构拟“们”的早期语音形式的话, 理论上至少有四种可能, 即  $mən$ 、 $məŋ$ 、 $mə̃$  和  $mə$ 。但是在中古出现的文本中, 带鼻音的复数标记写作“懑”“满”“们”等形式, 这一组字都是收 -n 韵尾, 而找不到一个读音类似“名”、“氓”等收 -ŋ 韵尾的复数标记。这就说明早期肯定有个固定的来源, 是收 -n 韵尾的。根据佛教混合梵文中的复数标记 -s-min, 可以看到佛教混合梵文中就有 -min 作为复数标记的。所以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古汉语时期这些复数标记刚产生的时候, 它们的音韵结构都是 MVN 类型, 而没有 MVŋ 类型的。

综合以上三点, 可以推断, 汉语“弭”“伟”“们”“满”等双唇鼻音复数标记是在唐代通过印度僧侣和梵文佛经传入中国的。从源头看, 佛教混合梵文和印度—雅利安语中的 -mi 系列复数标记来自达罗毗荼语言, MVN 是此系列复数标记在印度—雅利安语言中的创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唇音首系列复数标记在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中很早就存在, 但是从东汉到隋唐佛典中的复数标记一般都是“等”或“曹”, 并不见“弭”或“伟”(龙国富 2013), 这有可能和翻译的约定俗成有关系, 此前复数标记一般都译为汉语常见的复数标记“等”或“曹”, 那么就没有必要新造一个复数标记<sup>①</sup>。类似例子很多, 如宋代文献《默记》中“孩儿懑切记”的“懑”, 说海本和涵芬楼校印本都改作更为常见和书面化的“辈”(吕叔湘 1985:56)。

但是对于唐朝西北地区民众来说, 随着印度僧侣的大量进入并建立学校、讲授佛经, 民众可以直接接触到印度僧侣以及他们的语言和文字(除了梵文和佛教混合梵文之外, 可能还有其他印度—雅利安语言和达罗毗荼语言)。从使用频率来看, 人称代词是高频词汇, 比较容易通过语言接触传播和扩散。此外由于印度僧侣地位比较高, 言行比较容易受到信众模仿, 因此梵文、佛教混合梵文、其他印度—雅利安语言以及达罗毗荼语言的 -mi、-me、-mu、-min 就容易被西北地区民众借用, 于是汉语中就产生了“弭”“满”“伟”“们”等复数标记。

## 参考文献

- [1] 陈章太、李行健.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2] 戴 军. 2003. 《唐代寺院教育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3] 丁 钢. 1988.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 [4] 冯春田. 2000.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5] 付新军. 2018. 《近代汉语复数词尾的反复变化与共同语之关系》, 《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 [6] 高葆泰、林 涛. 1993. 《银川方言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7] 郝春文、陈大伟. 2013. 《敦煌的佛教与社会》,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 [8] 侯精一、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太原: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9] 介永强. 2010. 《唐代胡僧考论》,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 期.
- [10] 江蓝生. 1995. 《说“麼”与“们”同源》, 《中国语文》第 3 期.
- [11] 江蓝生. 2018. 《再论“们”的来源是“物”》, 《中国语文》第 1 期.
- [12] [宋] 李昉. 1961. 《太平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13] 李欧梵. 2004. 《福尔摩斯在中国》, 《当代文学评论》第 2 期.
- [14] 李艳惠、石毓智. 2000. 《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 《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sup>①</sup> 这种情况在翻译中是常见的, 比如“福尔摩斯”英文为 Holmes, 从普通话来看, 语音很不对应(李欧梵 2004), 但是至今还在沿用, 这就是翻译的约定俗成。

- [15] 李一飞. 1994. 《〈因话录〉作者赵璘的生卒与仕履》, 《文献》第4期.
- [16] 李映辉. 2004. 《唐代佛教地理研究》,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 [17] 《临潭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7. 《临潭县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 [18] 林 涛. 2008.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19] 林 涛、冯万和、范学灵. 1995. 《中卫方言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 [20] 刘俐李. 1989. 《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 [21] 刘 伶. 1988. 《敦煌方言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22] 龙国富. 2013. 《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中数的表达》,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23] 罗常培. 2012. 《唐五代西北方音》,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4]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示词》,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25] 吕叔湘. 2002. 《释您, 倏, 咱, 嚈, 附论们字》, 载吕叔湘《吕叔湘全集第二卷·汉语语法论文集》第1-35页,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6] 邵燕梅. 2005. 《郯城方言志》, 济南: 齐鲁书社.
- [27] 邵燕梅、刘长锋、邵明武. 2010. 《沂南方言志》, 济南: 齐鲁书社.
- [28] 太田辰夫. 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9] 汤用彤. 1982. 《隋唐佛教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 [30] 王 力. 2004. 《汉语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 [31] 许理和. 2005. 《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李四龙、裴勇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32] 严耀中. 2005. 《中国东南佛教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33] 杨剑桥. 2012. 《现代汉语音韵学》,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34] 叶晓锋. 2008. 《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学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5] 俞 敏. 1989. 《古汉语的人称代词》, 载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36] 袁 宾 等. 2001.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 太原: 书海出版社.
- [37] 袁家骅. 1960. 《汉语方言概要》,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38] 张成材、朱世奎. 1987. 《西宁方言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 [39]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 [40] 周季文、谢后芳. 2006.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41] 周勋初. 1987. 《唐语林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
- [42] 朱庆之. 2014. 《汉语名词和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产生与佛经翻译之关系》, 《中国语言学报》第16期.
- [43] 朱晓农. 2004.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 《中国语文》第4期.
- [44] 祖生利. 2005. 《近代汉语“们”缀研究综述》, 《古汉语研究》第4期.
- [45] Andronov, M. S. 2003.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ravidian Languag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 [46] Bailey, T. G. 1920. *Linguistic Studies from the Himalaya: Being Studies in the Grammar of Fifteen Himalayan Dialects*.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47] Bailey, T. G. 1908. *The Languages of the Northern Himalayas: Being Studies in the Grammar of Twenty-six Himalayan Dialects*.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48] Burrow, T. 2001. *The Sanskrit Languag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49] Edgerton, F. 1985.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 Grammar*.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 [50] Jäschke, H. A.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it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 Dass Publishers.
- [51] Krishnamurti, B. 2003. *The Dravidian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2] Masica, C. P. 1991. *The Indo-Aryan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3] Pattanaik, Ranjita. 2002.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Special Studies Orissa. Vol. 1*. Language Division,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India.
- [54] Rajam, V. S. 1992. *A Reference Grammar of Classical Tamil Poetry* (150 B.C.-pre-fifth/sixth century A.D.).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ume 199)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55] Rensch, Calvin R., Sandra J. Decker, and Daniel. G. Hallberg. 1992. *Sociolinguistic Survey of Northern Pakistan, vol. 1: Languages of Kohistan*. Islamabad: National Institute of Pakistan Studies, Quaid-i-Azam University and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56] Shen, Zhongwei. 2006. Syllabic nasals in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 No. 1:81-108.
- [57] Zvelebil, K. V. 1977. *A Sketch of Comparative Dravidian Morphology, Part I: Nouns and adjective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Practica 180). The Hague/Paris/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Indian Buddhist Monks' Massive Entry into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lural Marker *mén* 们 in Chinese

CHEN Yonglin and YE Xiaofeng

**[Abstract]** No agreement has ever been reached as to the origin of the plural marker *mén* 们 in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Sanskrit, som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and some Dravidian languages, all distributing in India, share the plural markers such as -me, -mi, -mu, -wu and -min, and these markers correspond perfectly to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mi* 弥, *wei* 伟, *mei* 每, *men* 那 and *men* 们, whose presence since the period of Middle Chinese is sudden and mysterious. It makes endeavors to tease apart these markers in respective languages and to extrapolate their path of dissemin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ndian Buddhist monks' massive entry into China in the Tang Dynasty, it is proposed that this set of plural markers in Chinese with the bilabial initial *m*-(> *w*-) should have come from the Indian languages.

**[Keywords]** plural marker *mén* 们 Buddhism dissemination the Silk Road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陈永霖 325035 温州 温州医科大学教师发展中心  
10248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叶晓峰 325035 温州 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